

【国外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对恩格斯的矛盾评价 及其理论启示

胡太平

【摘要】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症候阅读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其对象的认识)都直接受到了恩格斯的启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正是恩格斯阐明了科学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这一重要见解,给后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了“教科书”。不过,他又指认恩格斯始终囿于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为后来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路线打开了错误道路。这种“矛盾”的见解,乃是在20世纪60年代教条主义及其相反的人本主义语境下从“理论斗争”角度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权宜之计。其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于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叙事的前提和原则问题,从而为理解诸如“青年马克思”“马恩对立”等重大理论争论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同时,由于他后来检讨的“理论主义”错误,阿尔都塞实际上亦未能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以及恩格斯具体写作语境深入后来被误解的文本,而只是以“经验主义认识之误”简单解释了恩格斯被误解的潜在原因。

【关键词】恩格斯;阿尔都塞;经验主义认识论;意识形态和科学

【作者简介】胡太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20.6.117~128

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阿尔都塞是少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知识版图的学院知识分子之一,他在20世纪60年代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地位过程中建构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其后西方激进知识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原型,并在今天仍然激发着相关争论。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阿尔都塞回应了“青年马克思”、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资本论》的对象、唯物辩证法的性质和含义、历史科学的内容和规定等诸多重大争论,这些研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阿尔都塞亦提出了对恩格斯的独特理解,而这个问题不知何故并没有得到相关研究的充分重视。在涉及恩格斯时,一方面,阿尔都塞打开了新的思想史视域——称赞恩格斯真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性质问题,因此具有“教科书”地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恩格斯仍然受限于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并且为后来的萨特等人的人

本主义错误打开了道路。这看起来矛盾的态度,是阿尔都塞在特定语境中保卫马克思的旨趣和路径所决定的。为拒斥教条主义以及与之对抗的人本主义,阿尔都塞试图剔除历史语境对具体理论建构的影响而从纯粹的理论结构(即他所称的“提问方式”)来捍卫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正确地理解恩格斯作为创始人的意义,而是仅仅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并在这样做的时候,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不恰当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各种误解归咎于恩格斯的“误导”。由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中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阿尔都塞关于恩格斯的评价进行分析和回应,以期为今日深化恩格斯研究提出一些理论建议。

一、不彻底的“教科书”:阿尔都塞眼中的恩格斯
一般认为,阿尔都塞不仅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

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立场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提出的问题,有说服力地阐明了马克思思想革命的性质,从而科学地回应了“青年马克思”问题,基于马克思的思想革命为理解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独到而富有启发的解释,而且可以说,在一般意义上,他提出了一种有竞争力的关于思想史结构和变迁的马克思主义见解(与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相媲美)。这种见解是通过“提问方式”(problematic)^①和“认识论断裂”等术语表达出来的。因此,惯常阿尔都塞研究也都会按照他本人的提示,从这两个关键词来理解其与法国科学认识论(特别是巴什拉)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把握其实质和意义。这种研究大抵不错。不过,不能忽视的是,阿尔都塞本人也强调,他只是借用了来自雅克·马丁和巴什拉的概念来阐明在马克思科学思想中“处于实践的状态”、但未在理论上阐明的事实,而那个事实正是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所作序言所阐明的。阿尔都塞非常明确地将恩格斯视为自己“提问方式”概念、“认识论断裂”思想以及症候阅读法的先驱。

阿尔都塞认为,《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是对《资本论》所作的“非凡的理论说明”,“人们迟早有一天会把它作为教科书来学习”^②。这是从恩格斯阅读马克思的方法角度来说的,这也意味着,阿尔都塞独特的“症候阅读法”之原型在于恩格斯,而他只是借用精神分析术语将之理论化。在一个注释中,他明确强调:“我指出,马克思所说的颠倒实际上包含着总问题(problematic)的革命。但是后来我在阅读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所写的序言时惊奇地发现,我绞尽脑汁才表述出来的问题早就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了。因为恩格斯明确地把颠倒也就是原来头足倒立的化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建立与它们的理论因而它们的总问题体系的变革等同起来。”^③从这个说明可以看出,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通过“颠倒”比喻所表达的思想革命含义。当然,并不只有这一个证据。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在《资

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中的解释也是“十分出色的”,“因为它彰显了一门特定的学科的对象和它的术语体系、概念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更为明确,在那里,恩格斯从认识论角度清晰地指明了马克思的独创性。“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直接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阿尔都塞说,恩格斯“并不是诡辩地、偶然地提出问题,他是在以科学史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理论的领域中提出问题的”。^④

阿尔都塞说,“最令人赞叹的是,恩格斯说一门‘倒立着的’科学‘正立过来’,用以表示总问题变异的理论或断裂的理论”^⑤。他认为,恩格斯在以科学史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理论领域提出了问题。这意味着,他对马克思的思想革命的理解,不仅是准确的,也是自觉的。在阿尔都塞看来,在所有经典著作中,恩格斯这个提法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对马克思的提法作了明确解释。^⑥由于马克思是隐晦的而恩格斯则是明确的,这一次解释的意义自不必言说。在阿尔都塞看来,它正确地阐明了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的逻辑和性质。如果考虑该问题本身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核心意义,那么不难肯定,恩格斯在唯物辩证法问题上与马克思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且正是他清晰地为后世准确地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钥匙。因为这一点,阿尔都塞不吝溢美之词:“恩格斯以非凡的机智提出了这个问题,从而显示了他的天才。他寻根究底,抓住了最终的问题,他在问题以它的答案的绝对形式出现的地方抓住了问题,也就是说在答案以其绝对的论证理由使人们不能对答案有任何疑问的地方抓住了问题。”^⑦他如此强调恩格斯的意义:“恩格斯通过他的做法为我们指明的道路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遵循的道路:这正是马克思在建立历史科学的活动本身中建立哲学所遵循的道路。”^⑧当然,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和他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捍卫,也遵循了恩格斯的道路。

尽管阿尔都塞认为正是恩格斯揭示了马克思科学革命的性质,并且从提问方式角度打开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革命的道路,不过,他同时也对恩格斯持保留态度。在全部阿尔都塞的论述中,批评恩格斯具体观点的文字有不少,其核心就在于以下两条。

第一,阿尔都塞认为,由于受经验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并没有把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区分开来,因此“没有以同样的魄力从理论的对象的角度来思考这场革命的后果”^⑨。

第二,阿尔都塞认为,正是恩格斯的经验主义为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和萨特的人本主义开辟了道路。^⑩

概括起来便是,恩格斯虽然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思想革命的含义,但他本人却仍然囿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主体哲学思想,从而为后来的多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打开了大门。

二、令人费解的“经验主义”:对阿尔都塞的恩格斯批评之回应

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自觉理解了马克思的科学革命,但在解释这场革命及其重要观点时却没有贯彻下去,并为后来的误读打开了道路,这是一种矛盾。阿尔都塞认为,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恩格斯本人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阿尔都塞本人对待恩格斯的矛盾态度。

阿尔都塞对待恩格斯的矛盾态度并不难理解。这是因为,从考茨基开始,经由列宁到斯大林,再到阿尔都塞本人面对的法共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建构都明确地将自身合法性建立在恩格斯提供的依据上。与之相对,从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学,都将恩格斯作为“辩证法的内部毁坏”(套用诺曼·莱文语)第一人。在保卫马克思的过程中,阿尔都塞也必须从理论上回应这一问题。从阿尔都塞的理论历程看,在反对教条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以葛兰西的“历史主义”为代表,

还是以萨特的“人本主义”为代表)时,他并不主张将问题的起点追溯到恩格斯(否则就不会产生上述“教科书”之说),但同时也认为不能否认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建构挪用了恩格斯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就如他出其不意地提出保卫马克思的前提问题,在恩格斯的理解上,他实际上做出了一个含蓄的转换,指认了既往全部误读的方法论(或思维方式)问题——即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恩格斯用实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重大观点时混淆了理论对象与经验对象的差异,从而为后世的进一步误读留下话柄。换句话说,阿尔都塞并没有真正去回应恩格斯问题,而是试图将全部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归结为经验主义认识论,这既为解释马克思之误读现象,又为评价恩格斯的贡献,提供了一种认识论方案。

我们认为,这一方案是特定语境的产物,是失败的。这一失败,既在抽象水平上如阿尔都塞本人后来所检讨的那样,犯了与结构主义调情的“理论主义”错误,又在具体案例中忽视了恩格斯文本的语境和实际价值。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阿尔都塞对恩格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判断令人费解。在此,我们首先以阿尔都塞评价恩格斯时运用的具体实例来阐明其“经验主义”定义之特色及其内在的张力,然后考察他对这些例子的判断。

在阿尔都塞的讨论中,他在不同的地方运用了多个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解释,作为实例说明他囿于经验主义认识。在这里,我们撷取两个典型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致施米特的信中关于价值规律(概念)的辩护,在辩护中,恩格斯强调概念不等于现实,概念与现实是两条不断接近但永远不会相交的渐近线。阿尔都塞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论证和“平庸的”回答,是对马克思主义敌人之“恶意的解释”之“善意的评论”。原因在于,“恩格斯根据经验主义的认识理论把恰恰表现出马克思的一致性概念的理论力量的东西当作由概念产生的缺陷”^⑪。在阿尔都塞

看来,这是一种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价值规律概念与马克思研究的对象完全一致,只是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这个概念并不对应于任何现实对象,而只是用以解释现实现象。第二个例子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回应了法尔曼对马克思的评论。阿尔都塞认为这一评论混淆了概念的理论发展与现实历史的起源问题。类似的问题同时也出现在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例如,涉及杜林对生命的定义时,恩格斯试图告诫读者:“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⑩阿尔都塞认为,这两个段落典型地反映了恩格斯受困于经验主义思维,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等同起来,并因此使概念从属于现实历史的现实规定。他说:“为了把概念的发展和现实历史的发展等同化,就必须把认识的对象和现实的对象等同化,使概念从属于现实历史的现实规定。这样,恩格斯就给历史理论的概念加上了一个从具体的经验次序(历史的意识形态)中直接借来的活动性的系数,从而把‘具体的现实’变成了‘被思维的具体’,把作为现实变化的历史变成了概念本身。”^⑪

在理解阿尔都塞对恩格斯的批评时,需要深入了解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革命辩护的思路和特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挪用“经验主义”这个术语来概括马克思所超越的近代认识论,即将感性经验作为知识上的唯一来源的认识论路线。当然,阿尔都塞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又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说:“把知识理解为现实对象的现实组成部分,将之投入现实对象的实际结构之中,这种做法构造了经验主义知识概念的特殊提问方式。”^⑫实际上,他并非在哲学史常识上使用了这个用语,而是赋予其新的含义,即将之视为屈从于经验现实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核心特征。这是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认识论中的经验

主义表现为主体对本质的占有。抽象概念尽管有各种特殊的形式,但它始终表示一个不变的结构。因此,在经验主义视角中,现实范畴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会重复出现。也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他才能够将历史主义(决定论)与人本主义视为统一结构,而不管葛兰西、萨特等人的巨大逻辑差异,并将之与恩格斯联系起来。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科学上实现了革命(即他所说的马克思的“认识论的断裂”),其核心在于区别了经验对象和理论对象,并通过后者为理解前者的本质打开了科学视角。例如,他强调:“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被思考为历史结果的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一结果的起源理论来理解这个社会,而只能通过‘机体’理论即社会现实结构理论来理解这一社会。”^⑬以有机体或社会概念为例,阿尔都塞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必须从其理论对象入手加以理解,而这样做时,又绝不可以将其与经验对象等同甚至对应起来,否则会在理论上回到现实起点从而丧失科学之“批判”和“革命”的意义,重新陷入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用“经验主义”来概括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要完整地理解他的这一做法及其意义,需要理解他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说明以及他所说的科学的实际含义。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通过抽象的图式解释了科学认识或者说科学实践的机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方法的说明,阿尔都塞强调,科学是通过概念来工作的,这些概念并不等于经验对象,他说,科学从不把以单纯的直接“感觉”和独特“个体”为其本质的存在物当作加工对象,他把那种相反的认识视为经验主义的或感觉论的意识形态幻想。^⑭那么,科学和意识形态在对象上是如何区分开来的呢?阿尔都塞强调科学的任务是用自己的工具(作为生产资料的理论,他称之为“一般乙”)把意识形态性质的现有概念(他称之为“一般甲”)加工成“具体的”一般(他称

为“一般丙”)。我们看到,阿尔都塞实际上试图从认识论上区分出科学和意识形态,在这一视域中,科学和意识形态都是话语,两者差别的焦点在于决定在其中出现的所有问题的提问方式。科学提出了新的问题,而意识形态则是根据既有答案来提问,并因此总是服从于为既有现实辩护的目标。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实践立场。值得强调的是,阿尔都塞将提问方式理解为思想内部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尽管其是思想内部的事情,但本质却不在于内在性,而在于同具体问题的关系。他由此来保障这一视域的唯物主义立场。实际上,阿尔都塞的“提问方式”概念与福柯的“知识型”类似,都是取法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用来揭示知识之先验条件的概念工具。正如结构本身乃是位于主客之间中介着两者的那种客观关系类型,由“提问方式”或“知识型”所描述的知识之先验条件,既非笛卡儿—康德立足的人类认识能力,亦非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话语。

话语的对象不是现实对象,而是它自己定义的认识对象。可以说,借助话语理论关于理论对象与实在的区分,阿尔都塞试图打破近代哲学的反映论。在反映论中,真理便是与实在对象的符合,而理论的进步则表现为追随着现实脚步并在其范围内给出“答案”的过程。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乃是一种意识形态,其误把概念(关于认识对象的认识)理解为需要认识的现实对象的现实部分,并将之作为本质。为保证科学本身的纯粹性和绝对性,阿尔都塞不惜冒着切断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风险,将科学锚定在自身的理论结构上,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现在,我们深入阿尔都塞批评恩格斯所使用的例子,考察他的判断是否有效。我们从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针对法尔曼的误解而对马克思话语的评论入手。阿尔都塞引证了下述恩格

斯原文:

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東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⑦

阿尔都塞主要关注的是这里关于定义、概念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是两回事。当然,我们也这样认为。不过,阿尔都塞以此作为论据指认恩格斯犯了他所说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如果不是刻意曲解,就是吹毛求疵。

首先,在理解恩格斯这段话时,需要了解其产生的语境。《资本论》发表后,特别是马克思逝世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指责马克思在剩余价值问题上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并由此否定马克思的科学发现。针对这一问题,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通过专门范畴及其与特殊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阿尔都塞关注的问题,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这种关系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过程形成的,而《资本论》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揭示了那些特殊形式之间的转化关系以及决定这种转化的商品生产机制)阐明了(作为前提的)价值理论之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从方法论角度强调了突破“既有的经济范畴”之束缚的科学意义,提出了阿尔都塞所大加赞赏的那个关于科学的著名观点:“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⑧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中,恩格斯继续了这一话题,他回应的是《资本论》第二卷出版后威·勒克西斯、康拉德·施米特等人所提出的价值规律和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恩格斯早就在反驳洛贝尔图斯谈到价值理论时便已提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以法尔曼为例子进一步阐明了人们对马克思理论之误解的方法论原因,即满足于既有经济学范畴和僵硬的定义,而忽视了范畴的历史或逻辑的形成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阐述了其关于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的看法。这是因为,法尔曼的问题在于,理论上对剩余价值率的认知与经验上平均利润率之间的“脱节”。实际上,这种“脱节”的原因在于,没有看到剩余价值和利润虽然是两个“理论对象”,但它们在量上是同一个东西。马克思已经阐明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认知上的脱节或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式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⑩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商品生产的拜物教结构中必然会产生对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误读。与之相对,马克思强调是“内在联系”,这也是科学的意义所在。在这种科学视域中,“价值规定”是“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来阐明剩余价值和利润、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才能正确地理解商品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和结构。^⑪当然,在科学的结论中,“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与现象之间“内在联系”大白于天下,而那种矛盾的假象亦消失。这既是经验的,又是理论的。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照马克思的分析过程和具体结论与恩格斯的辩护来判断其是否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对于阿尔都塞来说,需要他回答的是,在非凡地揭示了马克思的沉默之意(《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的同时,恩格斯何以陷入了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泥淖(《资本论》第三卷《序言》)?在这里,我们需要进

一步提醒的是,正如阿尔都塞所强调的那样,这与马克思在表述自己科学发现过程中的不完备有关。之所以需要恩格斯苦口婆心地解释,乃是因为马克思未及时对利润率产生的历史进行公开解说,那正是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时必要的增补之内容。通过这一增补,恩格斯指出,桑巴特、施米特和洛里亚等人的问题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⑫。也就是说,要准确地理解价值规律,需要理解利润率的历史产生。

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中的“论述是十分出色的,因为它阐明了一门特定的学科的对象和它的术语体系、概念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阐明了对象和它的术语以及与之相应的概念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⑬。实际上,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对法尔曼的批评,以及他所增补的有关“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的内容,焦点都是要澄清价值规律所描述的内容与经验表象上的“矛盾”,从而捍卫马克思分析的科学性。术语问题并非恩格斯设计的辩护路径,而是由马克思的异议者在论证中所提出的。

其次,由于术语(概念)是我们阐述事物内部联系的手段,在上述语境中,术语也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述的只是一个方面,即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术语革命。这是阿尔都塞特别关注的方面。同时,还存在新的观点传播问题。在这一点上,新观点的传播必然会受到既有思维方式和术语的阻碍。恩格斯实际上便面临着这个问题。从恩格斯的说明看,他的辩护主要是基于这个考虑,“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因此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困难。所以,在恩格斯看来,捍卫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性,需要对术语进行澄清。他举例强调:

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②3}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论差异,通过术语就表达出来了。同样,前面提到的阿尔都塞颇有微词的《反杜林论》准备材料关于生命的定义,亦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在那里,恩格斯只是试图以自然科学的例子来阐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上,随着生命形态的进化,必然会出现新的描述性术语,但归根结底,科学的目标在于揭示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本质差异。这一点在公开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其原始文本是《反杜林论》第三部分)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得到更清晰的强调。在那里,恩格斯说:

近代化学家宣称:只要知道某种物体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准确地认识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不会有这种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制造人造蛋白。我们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就制造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②4}

这样看来,可以说,在马克思推动的科学初创之际,恩格斯的辩护是根据时代的语境进行的,将术语作为切入口,是他的一种恰当的策略。

再次,在恩格斯对马克思科学思想进行澄清的过程中,他使用的例子具有比喻性质,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逻辑的需要,与经验主义无关。阿尔都塞抓住了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所使

用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这个比喻。在阿尔都塞看来,恩格斯关于对经济因素“归根结底”决定作用的理论解答,实际上与其用来反对经济决定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论点无关。这种判断的关键理由在于,恩格斯对上层建筑的理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的意思是,恩格斯所使用的例子与概念并不具有对应关系。在阿尔都塞看来,合力论是正确的,但却不是讲上层建筑问题的,而是力量关系中相互冲突和相互组合的个人意志,并且基本含义亦陷入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阿尔都塞说:

不幸的是,这个如此可靠的立论根据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这个如此可靠的原则只能引向茫茫黑夜。它至多只能证明它自己,只能作为固定不变的根据反复肯定自己的显而易见。这种显而易见是什么呢?必须承认,它无非是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前提假设。^{②5}

这个意识形态即马克思批评过的经济人神话。在阿尔都塞看来,人本主义之所以是意识形态,乃是因为它所理解的人已经是经济人了(还有理性人、法人等形式)。这种意识形态采取了近代主体哲学的基本立场,在其视域中,历史必然性乃是主体意志的实现方式。

结合阿尔都塞在其他地方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可以认为,这种批判极为深刻地切中了问题的本质。不过,阿尔都塞在此硬将“合力论”比喻解释成主体哲学的残余,确实牵强了。从整个书信看,恩格斯试图说明的问题是“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并不能还原为经济决定论。在阐述经济的作用时,他区分了“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与偶然事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正是他晚年在不同文本中解释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基本立场,并且这个立场直接来自《资本论》)。为阐明这一观点,他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以德意志历史为例从人类创造自己历史所需要的确定前提和条件入手强调经济归根

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二是以合力论作为比喻阐明偶然的作用及其意义。必须强调的是，恩格斯使用合力论本来就不是讲述上层建筑故事的，他这里的论述并不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叙述作为基础的经济作用方式。同时，就合力作为“总的平均数”而言，其实质乃是在偶然性（个人意志）背后发生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体现出来的必然性，它是一种结构，而不是作为表象的结果。因此，阿尔都塞的批评在直接的意义上刻意曲解了恩格斯的论证方式。

在此，必须提及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而对于理解恩格斯至关重要的问题。1870年以后，恩格斯离开商业重新回到理论战场，其重要工作便是回应社会（特别是工人运动内部）对影响越来越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挑战。无论是《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还是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甚至是他为《资本论》不同卷次和版本所写的序言，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其后来构成正面叙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和核心观点的依据的论述，恰恰是在反驳对手的过程中形成的立论。那些论点本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构成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方案则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在特定的语境中，恩格斯完成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使命，至于将其方案教条化，并不能归咎于他本人。阿尔都塞选择诸如此类的例子进行非语境化的解释，并试图证明恩格斯为后来的曲解打开了大门，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在总体上，可以说，阿尔都塞并不关注恩格斯写作的语境（特别是论战性质），而只是认为其在术语的使用和分析过程中没有清晰地区分理论对象和现实对象，并因此陷入了经验主义意识形态。这就把恩格斯简单化了，而他的解读本身则把问题复杂化了。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阿尔都塞的具体论点并非一成不变，他对恩格斯的评价，不同时期的文本对同

一问题的性质判断亦有差异甚至冲突。例如，关于上述提及的恩格斯《反杜林论》准备材料，在1953年的笔记中，阿尔都塞对这个段落高度评价，以其为例来说明恩格斯最恰当地阐明了唯物主义与一切先验哲学在根本上的对立。^⑥在那时，他试图进一步发挥列宁的认识论思想，强调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变的意义，即认识论的科学前提保障。而在《读〈资本论〉》中，同一个例子则成为恩格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证据。这种前后不一致，不能忽略。这涉及阿尔都塞思想评价的基础：他的观点并非从一开始至其结束一成不变，相反，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经历1968年“五月风暴”，他的论题与主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个文本的“理论主义”之误进了检讨，并重新定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理论实践。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阿尔都塞的恩格斯批评及其得失评价，同样需要在确定的语境中进行，就如我们提出对恩格斯的正确理解需要将其文本语境化一样。

三、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阿尔都塞的得失

我们阐明了阿尔都塞评价恩格斯的理论框架，亦回应了他对恩格斯经验主义的批评。在我们看来，对恩格斯的矛盾评价乃是阿尔都塞特定时期的立场。其对恩格斯的批评之误，主要原因在于他脱离了恩格斯论述的具体语境，认为恩格斯的结论或例证迁就了现实从而偏离或污染了（一般）理论的纯粹性。实际上，对恩格斯评价的矛盾，集中反映了阿尔都塞在创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期间的矛盾：为清除法共的教条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与之对抗的人本主义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保卫马克思的过程中，他不惜擦除既有的对马克思的理解和运用，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维系在纯理论上。

在更具体地理解阿尔都塞对恩格斯的评价的理论意义时，同样需要理解其对恩格斯的批评在保卫马克思过程中的独特性：客观上，恩格斯一直被当成

马克思主义体系建构的主要依据。因为这一点,不仅是阿尔都塞,包括今天的我们都需要阐明这个历史矛盾: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解说来建构马克思主义体系,何以出现了苏联主流教科书原理和教条主义的历史错误。我们可以通过阿尔都塞将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这两种实际差别极大甚至相反的解释路线等同起来这种反常识的做法来理解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阿尔都塞认为,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是建立在同一意识形态提问方式上的,并且它们一直威胁着马克思主义。他有意地使用“反人本主义”和“历史科学”两种提法就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断裂”(革命)的意义。这一点,他多次解释。在他看来,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和宿命论斗争不得不采取唤起人们的良心和意志的形式,这便使人本主义成为公开的旗帜。历史主义,特别是通过葛兰西的“绝对的历史主义”概念表达的见解,实际上又把历史降格为本质(客观概念,在阿尔都塞看来,即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决定当下现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尔都塞将葛兰西、萨特、科莱蒂等在逻辑上差异很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并列起来,并将之与恩格斯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路线相联系。在阿尔都塞看来,其焦点是:

把科学自身的历史归结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历史并使之等同起来,这最终就是把科学归结为历史,把历史当做科学的“本质”。在这里,科学向历史的跌落不过是表示一种理论的跌落即历史理论向现实历史的跌落,其结果就是把历史科学的(理论)对象归结为现实历史,从而把认识的对象同现实的对象混同起来。这种跌落也无非是向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跌落,在这里,哲学和现实历史则扮演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角色。^⑦

尽管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时期,阿尔都塞的思考具有明显的缺陷,不过他坚定地从事科学革命角度来清理意识形态地基,从而为马克思主

义的与时俱进打开了理论空间,就此而言,他的思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基础性问题: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工作的意识形态环境,便不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科学大道。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革命之际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文本记录下来重要启示。同时,从更长历史时段来看,阿尔都塞后期也极大地克服了自己早先唯理论的缺陷。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考,体现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他对恩格斯的评价作出三点思考。

第一,不仅是对恩格斯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构成理解和评价恩格斯的思想史前提),阿尔都塞提出了迄今为止最重要且最深刻的前提反思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全部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的理论自信。

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通过《论青年马克思》一文,阿尔都塞试图通过“青年马克思”(这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提)问题提出这个对于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至关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即他所说的“我们在经历了考验、挫折和软弱以后内心压抑不住而必定要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究竟怎么样了?它在理论上是否能够站得住?如果能站得住,它有什么特点?”^⑧。在斯大林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双重挤压下,这是难得的让人清醒的声音。或许,这便是其在当时引领形成了以其讨论班弟子为主要成员的“阿尔都塞主义”的直接原因。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的《序言》以及1967年为《保卫马克思》各种外文版所写的后记(即《致读者》)中也非常明确地强调了他言说的背景和旨趣。在1985年留下的自传《来日方长》中,他更是明确地将自己的《保卫马克思》解释成通过“回到马克思”来清除斯大林教条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错误的策略,并且在他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途径”^⑨。虽然在这一途径中出现了他后来检讨的“理论主义”错误,即把视域局限于马克

思本人的文本,但他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上提出了这一基本问题: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底气究竟在哪里?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将如何言说今天?或者换一种方式说,今天,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何言说自己?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没有这一思考,我们就配不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固然,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局限于文本(思想史上的革命),而是始终与事件(阶级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实践。在这一意义上,正如阿尔都塞对《保卫马克思》所作的检讨那样,纯粹的理论主义也脱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他后来将《保卫马克思》中主张的理论实践进一步解释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试图弥补其讨论缺陷。不过,在上述分析的特殊语境中,他从科学史的科学理论标准(即他所称的“思考的现实理论形态”的理论概念)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并且坚持认为(和证明)马克思的思想革命同时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理论,确实在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和发展史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提供了一种可以证伪(实)的“研究的前提条件”。这个问题关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争论,意义非同小可。

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是由“提问方式”和“认识论断裂”这两个关键概念勾勒出来的。我们不必计较它们来自其他人的研究。真正的问题是,阿尔都塞借助它们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论历史的理论,并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如后来朗西埃所说的那样,或许,阿尔都塞只是提供了一种“正当性话语”(discourse of justification)^⑤,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开放性真正敞开了。阿尔都塞证明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前提的错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决裂,他也试图为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科学史的证明。这些只是例子。真正重要的是,以今天中国学者偏爱的方式来说,通过这些例子,他真正站在了“以马解马”的立场

上: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读懂马克思的著作。比这一口号更重要的是,他阐明要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著作,需要正确的读法以及对那些表面上构成“问题”、影响阅读马克思的“问题”(例如“青年马克思”问题)的正确理解。这就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推到政治、理论和历史的前台,并迫使我们按照马克思那样去思考。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指出,恩格斯正是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和发展史的第一个这样的例子,即“人们迟早有一天会把它作为教科书来学习”的例子。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真正的理论不就是沿着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这些伟大的台阶,走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境界吗?

第二,尽管阿尔都塞并没有全面回应“恩格斯问题”,亦没有提供一种褒贬一致的结论,而是留下了一种矛盾的说辞:恩格斯只是一部自己也没有能够写出来的教科书。不过,必须肯定的是,他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策略亦为正确地理解“恩格斯问题”的性质及其回答提供了卓越的视角。

在全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上,恩格斯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去世后12年间的首要解释者。这一独特的境遇使恩格斯成为“本真的马克思”探问之“绊脚石”,并因此形成多种批评恩格斯的景观。例如,卢卡奇从左的方面试图在理论上将第二国际的失败归结为教条主义错误,而根源又归为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忽视;摆出中立面孔的吕贝尔则直接将恩格斯视为歪曲了马克思原意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从右的方面,从伯恩斯坦到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都通过搬开作为革命家和辩证法大师的恩格斯来排斥马克思主义。长期的理论和政治争论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关系”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史问题,并进一步使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变得含糊不清。

阿尔都塞对恩格斯经验主义的批评,需要从这一客观的思想史角度来理解。这一历史实际上已经把恩格斯作为“辩证法内部破坏者”的形象客观化。这是因为,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体系,还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抑或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考茨基以降,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主流解释,都直接把自己的根据建立在对“恩格斯的某些不幸的文本”(阿尔都塞语,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的解读上。20世纪50年代,阿尔都塞在反思斯大林教条主义时对这些问题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并且形成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在强调的一些重要看法。例如,他认为,斯大林“曲解了恩格斯关于‘物质与运动’之类的不幸的命题,并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某种可以通过物质来理解各种哲学论点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或形而上学”^⑧。在他看来,人们把马克思的思想革命归结为“三个来源”的简单汇合,然后借助于“颠倒”等这些比喻性说法重复既有结论,而“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被重复,并且被扭曲或僵化”^⑨。他痛感:

马克思的大多数后继者所做的无非是对马克思本人加以重复(注释或解释),并且闭着眼睛跳进茫茫黑夜,即对于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对于党、对于政治的无知的黑暗中——更有甚者,则把马克思的思想颠倒成与他根本不相容的东西。^⑩

在他看来,这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过,谈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保卫马克思又谈何容易。从技术的角度说,穿过一大堆争议性的著作找到真经并不容易。从精神实质角度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并非寻找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握其方法。在阿尔都塞看来,问题并不在于那些具体的困难,而在于第二国际以来的理论发展缺乏独立思考。

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阿尔都塞主张“依靠自己去学会面对现实”。所以,他批评法共在非斯大

林化运动中追随人道主义思潮人云亦云,只是“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深信自己达到了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大陆,却不知道如何从哲学上去论证这一大陆的存在和可靠”^⑪。在他看来,我们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这便需要我们有独立的思考科学进步的理论。根本上,这又需要我们自身通过对马克思的阅读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提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形态史理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挪用了法国科学认识论提出的“认识论的断裂”思想,又借助“提问方式”这个术语汲取结构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视域。

尽管阿尔都塞并没有直接提出要解决思想史上的“恩格斯问题”,但他确实为正确理解并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我们看到,一方面,正如他对“青年马克思”问题的界定,在恩格斯的批评者定义的理论战场上回应那些批评并不困难,然而,只要在那些战场上作战,我们会陷入由批评的基本假设而造成的逻辑陷阱,从而无法正确地理解和评价恩格斯的贡献及其当代意义。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实际上也直接提出了对恩格斯文本的阅读问题。阿尔都塞必须面对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曲解的各种体系都是以恩格斯作为文本依据的,所以他称恩格斯的那些文本为“不幸的文本”。在他自己的阅读过程中,他一针见血地指认恩格斯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实际上便是解释了对那些“不幸的文本”误读之源。这就是说,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本人应该为那些后来的误解负责。不过,他亦强调,问题并不能由恩格斯一个人来承担。这是因为,处于思想革命过程中的马克思,由于多种话语的碰撞而产生了犹豫和术语混乱误导了恩格斯。阿尔都塞强调,正是马克思本人在应该直接提出问题的时候选择了沉默,而在那沉默之处,以经验主义形式出现的“自然而然的”意识形态话语大声说话。这种沉默乃是一种话语在另一种话语的压力和排斥作用下产生的缺陷。^⑫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正是马克思自己使用诸如“颠倒”这

种“不确切的”说辞来描述他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跟着马克思解释的恩格斯则掉进了陷阱。^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通过强调恩格斯首次指出了马克思科学革命的性质并因此提供了对马克思具有“教科书”意义的解读,阿尔都塞实际上试图把对恩格斯的解读从经验主义认识论中拯救出来。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为我们正确解开思想史上的“恩格斯问题”提供了方向。遗憾的是,在阿尔都塞之后,无论是表面上摆出客观中立姿态的吕贝尔,还是试图跳出思想史研究传统误区而恢复作为独立思想家之恩格斯的卡弗,抑或赞赏阿尔都塞的诺曼·莱文,这些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从来就没有达到对思想史的正确理解,只是在思想史研究中低水平地重复经验主义认识之误,即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无论恩格斯本人的创作还是后来效果史对恩格斯文本的“运用”,实际上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理论斗争的结果,如果不从这些条件出发正确地阐明思想动态、恩格斯的作者功能及其实际反响,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史,不能理解恩格斯在这一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在我看来,阿尔都塞虽然没有给“恩格斯问题”提供答案,但正如其对科学的理解,当他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就给已经变得乏味的学术史带来了使之活起来的思想。

第三,作为特定时期的思考,阿尔都塞的纯粹理论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旨趣和品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为学院知识分子自由地操持马克思主义话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便利,但对于人类解放事业来说,却是巨大的裂口和伤痛。这是隐含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主义策略中的最深层矛盾。对于这一矛盾的警觉,是今天所有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维持自己最低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前提。

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语境中,教条/科学关系、科学/意识形态关系、人本主义的性质等是问题的焦点。阿尔都塞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是,革命理

论形成之后,如何维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这不是新问题,而是第二国际之后便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大问题。在法共教条主义(受斯大林主义影响)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挤压下,阿尔都塞可贵地试图通过以科学史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作为前提把政治教条(斯大林主义)和知识教条(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一并加以拒斥。在这一过程中,他确实挪用了巴什拉的“科学观”和“认识论的断裂”思想(在这一理论视域中,科学没有外在于其活动的对象,也就是说,科学创造了自己的对象),也直接借助结构主义思想来阐释唯物辩证法(在这一理论视域中,历史不复由任何因素决定而是由各种关系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并因此产生了自身独特的问题。就其对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来说,把科学仅仅理解为认识的成果,便切断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使纯粹科学成为无根的抽象活动;切断理论对象与现实对象之间的联系,也就阻塞了从科学理论到革命实践的通道,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作为一种“无用的激情”(萨特语)的象牙塔活动。关于这些问题,他的同时代知识分子都留下过批评,比如说,从右的方面,雷蒙·阿隆尖锐地指出了其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实质倾向。在阿隆看来,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恩格斯可能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可能的?或者:人们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人们何以能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⑨基于这一点,他把阿尔都塞与萨特以及梅洛-庞蒂视为一丘之貉,即法国教育体制中试图统一革命憧憬和精神满足的那些追求教师资格者(即正规学院派)。虽然阿隆的这个判断过分情绪化了,但他准确地阐明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语境下不同于法共教条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核心特征。从左的方面,爱德华·汤普森认为,拒斥“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主义”的阿尔都塞,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解释乃是一种“理论的贫困”。他认为,虽然阿尔都塞试图剔除斯大林教条主义,但其辩证唯物主义

在实质上却是“高级斯大林主义”。^⑧

这些是阿尔都塞必须要检讨的地方。我们看到,他的检讨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例如,对哲学/科学关系,他后来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他将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而在后来的讨论班中,则将之理解为通向正确立场的“赌注”,并且进一步依据他对列宁的理解,解释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⑨通过这一检讨,阿尔都塞试图正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琢磨问题的时候要有点阿尔都塞式的精神,但也不要把自己整成阿尔都塞派学者。阿尔都塞式精神,是通过其对抽象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表达的,即对我们自己本能的抗拒,迫使自己深入马克思的思维过程,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历史;阿尔都塞派学者则是阿尔都塞以及巴迪欧、朗西埃等弟子那样的理论家,他们通过无止境的文本解读来追求纯粹理论意义上的科学,这样的解读从来就不曾超出教学的需要。现在应该是努力把教学的需要提高到环境的需要即历史的需要的时候了。在实现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恰恰是被阿尔都塞颇有微词的恩格斯具有更直接的意义,因为正是后者指出了“光荣而伟大的理论”乃是“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科学研究。

注释:

①这个术语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有不同的译法,本文采取“提问方式”的译法。在运用阿尔都塞著作既有中文译本时,我们在包括“总问题”在内的其他译法后面补充英文提示。

②[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9页。

③同上书,第58页。

④同上书,第135页。

⑤同上书,第139页。

⑥参见上书,第139页。

⑦[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35页。

⑧同上书,第139页。

⑨同上书,第141页。

⑩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矛盾与多元决定》之附录。

⑪[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70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667页。

⑬[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02页。

⑭Louis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Verso, 1997, p. 38.

⑮[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53页。

⑯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76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7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5卷第21页。

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87页。

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89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013页。

㉒[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34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33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02-703页。

㉕[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16页。

㉖参见[法]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㉗[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20页。

㉘[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3页。

㉙[法]阿尔都塞:《来日方长》,蔡鸿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㉚Jacques Rancière, *Althusser's Less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xxii.

㉛[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㉜同上书,第259页。

㉝[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60页。

㉞[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8页。

㉟Louis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pp. 88-90.

㊱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80页。

㊲[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㊳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Merlin Press, 1995, p. 107.

㊴[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5、174页。